

 红寺堡之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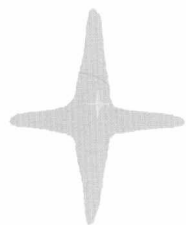
红寺堡

历史文化研究文集

HONGSIPULISHIWENHUAYANJIUWENJI

《红寺堡之光》编委会 编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红寺堡历史文化 研究文集

《红寺堡之光》编委会 编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序

中共红寺堡开发区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副主任 马维民

古代文献中有关红寺堡地域历史文化的记载、评述和研究资料,是比较丰富的。红寺堡历史悠久,其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。早在先秦,这里就有戎族的活动,并已归属战国秦北地郡的版图。秦汉时期,这里先属北地郡,后又归安定郡管辖。惜因红寺堡很久以来不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,所以其记述便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故当中,这给人们的阅读、研究和利用,带来很大的不便,以致有人怀疑红寺堡的历史如同其建区以前的地理环境一样,也是一片历史文化的“荒漠”。作为红寺堡人,如何继承和发扬红寺堡地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,首先要做的就是发掘和整理有关文献,以提供人们阅读、研究、借鉴的史料文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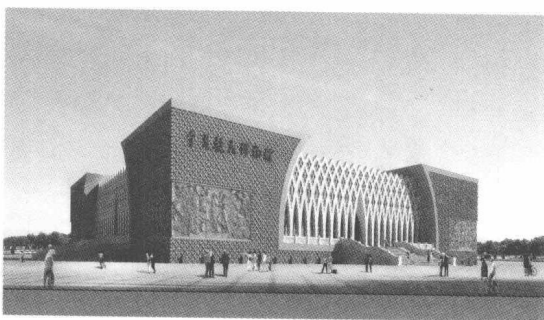
盛世修志,志载盛世。《红寺堡历史文化研究文集》是经过专家学者和编辑深入挖掘、广泛搜集,刻苦编纂的一部旨在反映红寺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文集。内容包括“考古考证”“历史大事”“文化·人物”及“宁夏移民历史”等,内容详尽,观点鲜明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文集搜罗广博,巨细靡遗,作者引用

文献不下百种,范围包括传统的经史子集,部分为常见的文献,但大多数是罕为人所见知者。这就为人们了解、研究和利用红寺堡地域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本书收集的部分文章,此前已在报刊上发表过。这次收入本书,作者又本着“认真负责,精益求精”的态度进行了认真的修改,使文章更具感染性、富有生动力。文集研究与普及相结合,本书既有学者深入的科研成果(论文),也收集了学者们写的一些科普文章,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。在当前,用准确、实用的科学知识向广大干部群众作普及工作,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更迫切、更需要。

2009年,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,也是红寺堡开发区建区10周年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,《红寺堡历史文化研究文集》的出版,对于推动红寺堡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促进红寺堡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但愿文集像一面明镜,记载历史,折射未来。祝愿红寺堡的明天更加美好、更加繁荣昌盛。

2009年8月

目 录



序	马维民(001)
---------	----------

考古考证篇

新旧红寺堡与红柳沟长城研究	鲁人勇	鲁晶宇(001)
罗山的得名与民族融合的关系	鲁人勇	(008)
宁夏红寺堡开发区古代历史研究	白述礼	(016)
从考古发现看红寺堡历史的新线索	牛达生	(066)
“义沟道宰印”考释	陈永中	(081)
红寺堡名称的联想	孙生玉	(085)
红寺堡名称的再联想	孙生玉	(091)
“红寺堡”探究	常 刚	刘嘉喜(101)
红寺堡建置沿革	周国宁	(106)
红寺堡远古遐想	王文举	(111)
红寺堡的堡寨、长城、烽火台	常 刚	(114)

历史大事篇

红寺堡地理形势及明代战事述论	王天顺	(125)
谈古论今话红寺——红寺堡地区军事史话	孙生玉	(136)



读史偶拾

——与红寺堡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关 杨森翔(193)

吴忠大地

——唐代民族共处的大舞 张树彬(273)

扬黄灌溉奠定了红寺堡开发移民的基础 张树林(292)

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综述 张耀忠(305)

人物·文化篇

大明庆靖王朱梅的罗山情

——红寺堡罗山文化探究 白述礼(326)

明代韦州、罗山的地理景观

——评《大明庆靖王朱梅》对韦州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 ... 汪一鸣(339)

红寺堡甜水河的民间传说 王文举 张正军(347)

红寺堡移民多元文化初探 张 敏(357)

宁夏移民篇

历史时期宁夏人口迁移的地理基础 汪一鸣(363)

宁夏移民的历史变迁 束锡红 夏亮亮(380)

豫鲁灾民移垦宁夏 胡迅雷(397)

绥西难童在宁夏 胡迅雷(409)

后记 41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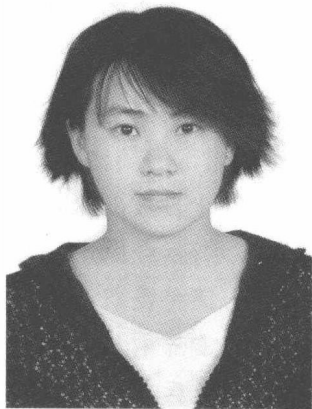
新旧红寺堡与红柳沟长城研究

鲁人勇 鲁晶宇



●鲁人勇,汉族,1941年生,重庆市万州人,1960年交通部重庆航运学毕业分配来宁,曾任交通厅史志办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、副巡视员。多年业余研究宁夏历史地理、丝绸之路。专著有《宁夏历史地理考证》《塞上丝路》《宁夏丝路览胜》(在台湾出版),主编《宁夏交通史》《宁夏通志交通邮电卷》。参加宁夏多部丛书如《宁夏风物志》《宁夏百科全书》《西夏通史》《宁夏日史》等编纂工作。

●鲁晶宇,汉族,1977年9月出生,重庆万州人。2008年北京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。现在宁夏交通博物馆工作,主要负责档案工作,并参与宁夏交通博物馆的筹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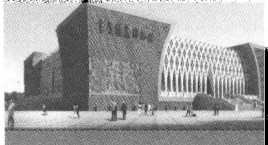


研究红寺堡的历史文化,首先要把红寺堡的历史弄清楚。现在大家都公认红寺堡古城堡始建于明正德二年(1507年),就是位于今红寺堡开发区西南约5公里团结村的那座古城遗址。但是,在查阅手中的明代史料后,发现这个结论尚待进一步论证。有足够的证据证实:明代先后建了两个红寺堡,当时就有“旧红寺堡”和“新红寺堡”之分。而修建“新红寺堡”,又与修建徐斌水到鸣沙的一段长城(因多为沿红柳沟铲削,以下简称红柳沟长城)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对这段长城,宁夏史学界、文物考古部门过去也未深究,只是在个别著述中提了一句。因此,本文特就这两个问题作一探讨,抛砖引玉,以期有识之士作更深入的研究、得出正确的结论,更期望文物考古界能以实地、实物根据印证或否定本文的观点。

一、刘天和筑红柳沟新边的奏议

明代称长城为“边”。因沿长城设有九个镇,所以又叫“九边”。今宁夏分属于宁夏镇、固原镇,或称宁夏边、固原边。宁夏镇因为处于军事前缘,所管面积不大,仅限于今宁夏北部和中部的一部分,但地位重要。固原镇位于第二道防线,防区面积很大,西面管到兰州,南面管到临洮,北面管到同心。

明代长期在固原设三边总制尚书,主管宁夏、固原、榆林三镇的军事防务。嘉靖十五年(1536年)春至十九年底担任此职者为刘天和,字养和,湖北麻城人,正德二年(1507年)进士出身。他上任时还兼兵部左侍郎,相当于国防部常务副部长。刘在任期间,多次因战功升迁封赏,第一年即授左都御史,后升兵部尚书。功劳最大的一次战事为嘉靖十九年。事先谍知吉囊(常住河套的鞑靼部落首领)部欲大举入侵,刘天和于六月初六到花马池一带部署防御。八月二十一日吉囊率五六万骑从定边拆墙入境抢掠,九月十日被击败退出长城外。当时,战线从延绥、宁夏一直延伸到固原的黑水苑(今原州区黑城镇)、西吉县的硝河。刘天和亲赴黑水苑前线指挥,见诸将畏缩,力斩两名指挥使,然后挥军进击,终于击溃号称“小十王”的吉囊部主力。敌兵溃败至铁柱泉,又被刘天和事先部署的宁夏巡抚杨守礼、总兵官任杰伏兵夹击。此役共斩首级四百四十颗,其中包括吉囊



第二子“小十王”及妻弟,对这场战事,《明实录》《明史·刘天和传》《皇明九边考》等都作了大篇幅记述。皇帝特“论功”加刘天和太子太保、荫一子锦衣卫千户,迁升南京户部尚书召为兵部尚书。刘天和在宁夏还指挥修筑了横城至陶乐的“河东长堤”及铁柱泉、梁家泉等城堡。

这里要着重介绍嘉靖十六年八月庚申日(公元1537年9月17日)刘天和的一份奏议。原文载于清刊本《读史方域纪要》卷五八第2560页、《明实录》卷二〇三第三、四页,后者录有准确时间。奏议的核心有三:

第一,原来所筑徐斌水至靖虏卫黄河岸六百五十里内边,“地势辽远,终难保障”,不如放弃另筑新墙。第二,采纳宁夏总兵官任杰的建议,从“今红寺堡东南起徐斌水至鸣沙州河岸二百二十里筑新边一道。”第三,“迁红寺堡于新边内,撤旧墩军士,使守新边,舍六百里平漫之地,守二百二十里易据之险,又占水泉数十处,断朔马饮牧之区。”

此奏议批转兵议决为:“旧边不可弃。”最后转呈嘉靖帝,责刘天和“无事生扰,姑贷不问;”而对任杰则斥为“擅兴妄议,夺俸半年。”

按以上两种文献的记载,筑徐斌水至鸣沙州新边、迁红寺堡之事只属被否定了的奏议,并未付诸实施。

但是,其他文献的记载表明,事情并非如此。

二、《皇明九边考》所记新、旧红寺堡及红柳沟

要了解明代长城及沿线城堡建置情况,最好能查阅到明代有关“九边”的著作,如《九边纪要》《九边图考》《九边全图总要》等。翻开明嘉靖刻本《皇明九边考》,其中的第八卷宁夏镇插有一幅《宁夏边图》。图上重点标画各段长城,其他内容极少。如当时的镇、卫、所、城、堡有近200个,但图上只标出了包括宁夏镇在内的31个城堡,也就是说,这些城堡在军事上比较重要,其中就有两个红寺堡赫然在目。具体是:

(一)旧红寺堡

标在内边墙的北面,其西南为徐斌水,其西略北为梁家泉。对照今天的地图,约在小罗山西北、辛庄集南偏东50余公里。当地现在的名字叫“旧寺堡子”。今天的地名与500年前的地图竟然完全吻合!《宁夏历史地



理考证》一书把红寺堡考订在“今新庄集乡境内”基本是对的。

(二)新红寺堡

标在鸣沙州的东南、徐斌水的西北。对照今天的实际情况,就在红寺堡镇西南的团结村。当地现存有明代城堡一座,南、西被红柳沟包围,呈不规则长形,长330余米,宽210余米。新修的扬黄灌渠穿城而过。遗址内明代甚至更早的瓷片随处可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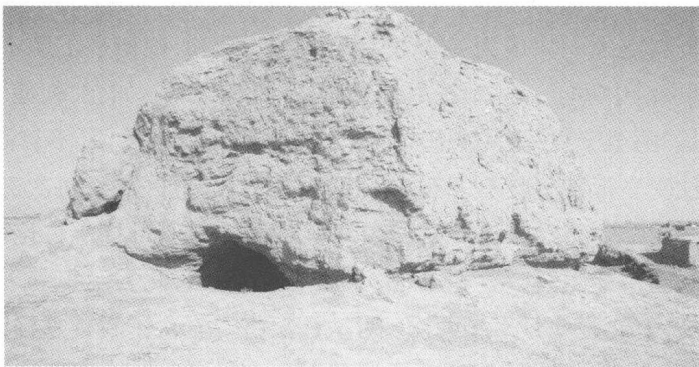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同一幅地图上新红寺堡的右上方,还清晰地划出了两道由东南向西北的长城。不仅如此,在这部书卷八的《保障考》的第四款中,又有如下记载:“新红寺堡直北稍东,总制刘天和新筑横墙二道以围。梁家泉直北稍西,旧有深险大沟一道,受迤东螺山之水流于黄河,长一百二十五里。总制刘天和塹崖筑堤一百八里五分,筑墙堡一十六里八分。自大边至此重险有四道矣。”大边指今盐池到横城的长城,又称外边。加上刘天和筑在新红寺堡的三道,总共是四道。如果说孤证不足信的话,那么还有《陕西三边四镇总叙·宁夏总叙》的记载,也与前面的引文一字不差。《万历固原州志·边隘》则按实际情况作了记载:“嘉靖十六年,总制刘公天和修干沟干涧六十余里,挑筑壕堤各一道,复自徐斌水迄鸣沙州黄河岸,修一百二十五里,增葺女墙,始险峻。”再说,有两点足以证实红柳沟新边及迁红寺堡的工程是付诸实施了。第一,刘天和原来奏议中的新边是二百二十里,因未实测,为约数;而《皇明九边考》的记述变成一百二十五里,是实际数。第二,深沟铲削的塹崖、夯筑的墙长度都详细到“分”,显然是实施之数。只可惜,二道横墙未注明长度。

《皇明九边考》这本书的作者叫魏焕,长沙人,字东洲。完成此书的时间为嘉靖二十年(1541年)“辛丑岁冬十月”。他当时任职“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”,相当于今国防部的司长,主管干部任免及“廉政”。此书完成后,附有一篇《叙九边考后》,看口气是送皇帝御览之用。所以付印后书名为《皇明九边考》。不久,魏焕升任兵部侍郎,大概也与写此书有关。魏焕“涉猎经史,博洽见闻”“殚心悉虑,宪度经政”“采摘群言,参互斟酌”,终于完成此事。由于“九边”之事完全归兵部管,此书的真实性应远高于其他同类古籍。因此,对新、旧红寺堡、红柳沟新边的存在、位置不应有所质疑。



三、嘉靖《宁夏新志》记载的红寺堡

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三灵州守御千户所的属城之下列有红寺堡：“东南至韦州七十里，西南至鸣沙州七十里。弘治十四年套虏举众寇固原，往返必经之地。十七年，指挥仇越伏兵破虏于此。”从到韦州、鸣沙州的里程看，它与团结村遗址（即《皇明九边考》



红海村2号烽火台

所标新红寺堡)吻合，但方位不对，至鸣沙应是西北。从“套虏”入侵固原“往返必经”一句看，又写的是徐水西北的旧寺堡子（即《皇明九边考》所标旧红寺堡）。因为当时所有的官吏在给朝廷的奏议中，都说铁柱泉、梁家泉、徐斌水一线是“套虏入寇固原”的“总路”。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五十八的“徐斌水堡”释文中也提到了红寺堡：“徐斌水堡，在西安所北百里，旧边在堡西南，新边在堡东北，为固原西路之要。其西北有红寺堡入灵州西界。”显然，作者指的是旧寺堡子。当时的徐斌水堡归固原镇管辖，红寺堡归宁夏镇管辖；边界在两堡之间的梁家泉南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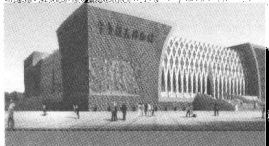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两点释疑

也许有人会问：迁红寺堡、筑红柳沟新边都不是小事，何以《嘉靖宁夏新志》只字不提？皇帝已经否定了的奏议，刘天和也敢斗胆“违旨”实行？



《嘉靖宁夏新志》成书时间为嘉靖十九年(1540年)八月,比《皇明九边考》早一年零两个月。此时新红寺堡已经筑就。作者管律是宁夏人,最高职务是刑科给事中。最大的问题是:此书是在三个月内匆匆重修的,难免有疏漏。即便是信息和交通都发达的今天,用三个月时间完成近30万字的志书,必有诸多缺漏。如写红寺堡,从到鸣沙、韦州的里程看,写的是新红寺堡;而其他内容如兴筑人、规模却写的是旧红寺堡;新、旧两堡的资料混到一块成为一个红寺堡。对刘天和,他似乎了解不多,虽在《铁柱泉碑》中写了一些颂扬之词,但都只是面子话。如在“朝使”中说刘天和只是“两至宁夏”就太离谱。刘天和光是因为在宁夏镇(不算固原镇)打了胜仗受皇帝褒奖就不下五次。起初,刘天和常住固原,每次进京、到榆林镇,往返都要路经宁夏。嘉靖十八年,朝廷采纳兵部主事许论建议,将三边总制尚书衙门“移镇”花马池(今盐池县城北),此后两年刘天和全年常住宁夏,怎能说他只来了两次?对铁柱泉将吉囊次子斩首这样的大事,其他有关《九边》的明代书籍都予详载,但《嘉靖志》在《俘捷》一目中只字不提,宁可写其他斩首二三十人的小战事。可以这样说,俘捷所写17个战例,没有一个能与刘天和那次斩首440级相比。对于宁夏镇境内已经修建的长城,管律笔下也漏掉不少。如嘉靖十五年同样由刘天和主持修建的“河东长堤”,从横城先接大边,然后沿黄河东岸经陶乐而北,至今仍能找到少量遗迹,但《嘉靖宁夏新志》也未作记载。对此,也无可厚非,因为以管律的经历、所接触的资料、档案,都不能与魏焕相比。因此,修建红柳沟内边及新红寺堡之事,属《嘉靖宁夏新志》的疏漏。

为什么被皇帝否决了的奏议也能实施?这有两种可能。第一,按文献记载,当时兵部议决的只是“旧边不可弃”,并未否定“筑新边”和“迁红寺堡于新边内”。第二种可能,在兵部议决、皇帝谕旨之后,当时就有几位大臣上疏支持刘天和的奏议。如礼部祠祭司主事许纶(此据《明实录》,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作“许论”;其职务《皇明九边考》记为兵部主事。)就说:“徐斌水至黄河岸六百五十里旧边,中间还有青沙峴一段八十里都是飞沙走石,连墙都无法筑,怎么守?青沙峴以北、(旧)红寺堡以南”“周顿阻旷,水泉四十五处,草木繁茂……红寺堡虽当其冲,而堡势孤悬,且外高内下,四面受敌,又去水甚远,取汲必于堡西之梁家泉。彼若据水头驻守,则立



毙也。诚筑新边于徐斌水东北,直接鸣沙州黄河西岸,所筑不满三百里,土坚易守,内包梁家泉等水泉数十处,又有林木之饶,耕屯可数十顷……此为固原西路计,利至厚也。”许纶的这段话,是今人了解明代红寺堡城及其周边环境的珍贵资料。朝廷对许纶的奏议如何处置,史籍缺载。也有可能改变以前的“议决”,因为许纶说得都比较切合当地实际。第三,因耗费不多,三边总制尚书有权自行组织实施。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,修筑的红柳沟新边工程量很少,筑墙仅十六里多,其余都是利用红柳沟的“深险”加以铲削,利用地形地物,所以耗费极少。建新红寺堡,工程量也不大,相当于五里边墙。这对于一个三边总制尚书衙门来说,是区区小事。

五、结 论

(一)红柳沟内边墙

起自徐斌水西北,向西北经新红寺堡至鸣沙,全长一百二十五里,其中筑墙十六里八分,利用红柳沟深险铲削堑崖一百零八里五分。明嘉靖十六(1537年)秋三边总制刘天和筑。

(二)旧红寺堡

位于新庄集南、徐斌水西北,今名旧寺堡子,明正德二年(1507年)总制、右都御史杨一清奏委指挥郑廉筑之。周回一里五分,置旗军四百一十七名。设操守官一员,管堡官一员。

(三)新红寺堡

位于今红寺堡镇西南5公里团结村,现存明城遗址,城墙周长1060米。嘉靖十六(1537年)秋刘天和移旧红寺堡至此。

(四)《皇明九边考》所记新红寺堡东北两道长城

虽在图上标出,但文字记述太简略,起点、止点、长度皆不详,亦无其他佐证,姑作存疑处理,有待文物部门实地考察核实。



罗山的得名与民族融合的关系

鲁人勇

罗山是宁夏中部最高的山,在同心县北部、吴忠市红寺堡开发区东南部。山之东为韦州平原,西为红寺堡平原,也是红柳沟与甜水河的分水岭。山体南北向延伸 50 公里,宽 2~5 公里。北段称大罗山,主峰海拔 2624 米。南段称小罗山,海拔 2000 米左右。1982 年批准为自治区罗山自然保护区。今天的罗山,林木极少,草灌稀疏,水源枯竭。但在古代,却是座林木葱郁、泉水淙淙、风景秀丽的宝山。山两侧的平原,宜农宜牧。至少在明代以前罗山周围是一个特别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,曾有数十个民族在这里安居乐业、和睦相处,最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。所以,罗山在我国民族融和的历史进程中,有厚重的文化沉积,与中华民族的融合有紧密的关系。

罗山在唐代叫达乐山、长乐山、铎乐山,宋代叫长乐山、乐山、下北山,明清称蠡山,现代因生僻难写,以谐音简化为罗山。这些名字,都打上了很深的民族烙印。

一、两汉时的匈奴移民与“蠡山”的关系

罗山在明代称“蠡山”。《嘉靖宁夏新志》卷三韦州之下考证说:“蠡山,在[韦州]城西二十余里,峰峦耸翠,草木茂盛。旧不知何名,洪武中,



庆府长史刘肪以其形似而名之。”“小蠡山，在大蠡山之南，其脉相承。”这里的“蠡”是古时“螺”的通假字，与“罗”同音。但是，罗山怎么看形状也不像一只螺。罗山一名之由来要重新考证。



罗山

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西汉的安定郡之下设有三水县，是“属国都尉治”，两汉统称安定属国或三水属国。其县治就在今下马关乡的红城水古城^[1]，位居罗山东麓的洪积带上。何谓属国？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：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“乃分徙匈奴降者边五郡故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故俗，为属国”。就是把降附而且愿意内迁的匈奴族安置在五个郡，不改变他们原来部族内的制度和生活习惯，只在军事上由朝廷派都尉管理。这是一种高度的民族区域自治管理。按《史记正义》的解释，这时的“五属国”分别在陇西郡、北地郡、上郡、朔方郡、云中郡^[2]。其中北地郡治马岭（今甘肃省庆阳市庆阳县北马岭镇），辖有今宁夏全境，当然也包括三水县治地红城水。这些匈奴族是哪一部？《汉书》没有说。按当时形势分析，应属卫青最初击败的南匈奴，即居住于河套以南的楼烦王、白羊王部。后来击败的北匈奴，当安置在云中、朔方郡。至于霍去病后来在祁连山下击败的浑邪王部，当安置在陇西郡。

又过了八年，即元鼎三年（公元前114年），朝廷将北地郡一分为二：其北部宁夏平原、东部的甘肃省庆阳地区仍属北地郡；今宁夏韦州、中宁县城以南及六盘山区、甘肃省平凉地区属安定郡。原“北地属国”所在地三水县划归安定郡，因此在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等史籍中，一般称之为“安定属国”，而不叫“北地属国”。

演变到东汉，安定属国的匈奴族都有一名单于治理内部，而且由朝

廷选定。据《后汉书·张奂传》记载,因为这里的匈奴单于治理无能,朝廷派来的属国都尉又贪得无厌,欺压民众,匈奴族不断发生叛乱事件,甚至大量制作“马革船”,渡过黄河逃到黄河以北。永寿元年(155年),朝廷派中郎将张奂任三水属国都尉。张奂的前八任都尉皆“贪财货”,所以匈奴各部落首领照例给新上任的都尉送来金银及良马。张奂却之不受说:“使金多如粟,不入我怀;马多如羊,不入我厩。”张奂“正身洁己”,使匈奴族人信服,于是“威化大行”,境内安定,叛乱事件也停止。张奂又保举一个部落的首领“左谷蠡王”为新的单于。这里的“左谷”可有两种解释:一是蠡山左(山之西为左)边的平川;二是匈奴的部族名。“蠡”则是匈奴王的名号。“蠡王”即为南匈奴的单于,其居地大山以他的名号命名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因此,蠡(罗)山的得名,应该源于在这里居住的左谷蠡王,始于东汉。

二、唐代吐谷浑的迁入与“达乐山”“长乐山”的得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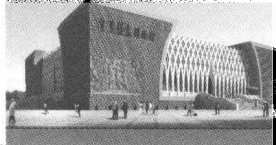
唐李吉甫的地理名著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四灵州之下记曰:“长乐山,旧名达乐山,亦曰铎落山,以山下有铎落泉,故名。旧吐谷浑部落所居……”^[3]

先说“旧名达乐山”。“乐”,是源于“蠡”的同音。为什么改名“达乐”?



罗山雪景

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卷一九八有详载:“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。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,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,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,置安乐州,



以诺曷钵为刺史，欲其安且乐也。”这里要特别注意“欲其安且乐”五个字。按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卷七记载，迁吐谷浑、置安乐州的时间为咸亨三年(672年)。这次迁入的“数千帐”，多是吐谷浑国内长期追随诺曷钵的上层人士，因而家大业大，人口众多。按最低每帐6口计，应有3~4万人之众。在隋朝及初唐时，吐谷浑还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，都城在伏俟城(青海湖西侧)，辖境包括整个青海省及甘肃省的张掖、武威地区。唐太宗采取“怀柔”政策，封其国王诺曷钵为“河源郡王”，又于贞观十四年(640年)将宗室女弘化公主送去联姻。武则天赐弘化公主姓武，改封西平公主，拜诺曷钵为驸马都尉。后来，吐蕃兴起，不断残食其领土，并大破吐谷浑军于河源地区。诺曷钵带领家族、臣僚及余部逃至今青海省大通河流域。因地方狭窄，又常遭吐蕃攻击，所以“不安其居”，要求内徙。唐朝同意在灵州原鸣沙县的西部择地安置，专设安乐州，“欲其安且乐也”。其州境包括今红寺堡开发区、太阳山开发区、韦州、下马关、中宁县的河南地区(鸣沙县属此州管辖)，也就是罗山的周围。弘化公主也随部族迁到这里，后来死于灵州府第，两年后殁于凉州，在甘肃武威保存的《弘化公主墓志》也记录了这次移民的过程。迁来后，整个吐谷浑部落达到“安且乐”的愿望，既然州名叫“安乐州”，山名也就因为已经“安且乐”而改为“达乐山”。明清之际的“大蠡山”，我们今天叫的“大罗山”，盖源于此，一脉相承，可以说一个音都不差。

至于长乐山，则是随州名而更改的缘故。唐至德年间后，各种史籍一般不称安乐州，而称长乐州。初来乍到需要“安乐”；既已安乐，则又盼长乐。二州实为一地。山名也随州名相应改作“长乐山”。叫铎落山则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因山下有铎落泉而名之；二是“达乐”音转而成“铎落”。不管是哪个名字，都与吐谷浑的迁来“安居乐业”有关。

这个吐谷浑部落后来到哪里去了？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^[4]卷一九八载：“吐谷浑……及吐蕃陷我安乐州，其部众又东徙，散在朔方、河东之境”。至德年间(公元756~757年)，吐蕃攻陷安乐州。今宁夏的盐池、惠安堡、红寺堡、鸣沙镇一线及其以南地区，全部被吐蕃攻占，安乐州亦在其中。此时，吐蕃族也大量进入红寺堡及毗邻地区，甚至连他们的驿骑也来到此地。据《旧唐书·吐蕃下》卷一九六载，贞元十七年(801年)七月，吐蕃攻